

# 文化遗传基因与生命本相体悟

## 关于『康定七箭』(下)

◎丹珍卓

### 贰

在人类的童年时代,民俗禁忌都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汉文化经典中的《周易》最早就是讲占卜的。占卜也是早期藏族认识世界、了解世界、预测事物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或方法。青藏高原民间至今仍传承和使用着种类繁多、内容庞杂的占卜术。从事占卜者,一般分为两种:一种是宗教职业者,如格鲁派的僧人、宁玛派的咒师,还有生活在民间的占卜师或苯教巫师,还有生活在民间的占卜师或苯教巫师,还有生活在民间的占卜师或苯教巫师。占卜重在观察事物的前期预兆,预测吉凶祸福与成败得失。笔者在康巴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得知,从古至今,占卜术形式多样,纷繁复杂却自成一体。康巴地区生活中较常见的占卜术是:“六字真言”卜、线卜、念珠卜、梦卜、骰子卜、石子卜、圆光卜、鸟卜、箭卜、鼓卜、指卜、釜卜、绳卜、骨卜……还有与他民族占卜文化

相类似的相人术、占音木、占脉木等等。比如梦卜。在藏族民间文化中,有关梦的资料极为丰富。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中记载最多的就是种种梦兆。藏族民间至今依然十分重视梦对人的各种启示作用,仍然将梦作为一种预兆。有关梦卜方面的文献如布顿大师的亲传弟子仁钦南杰所著《梦观察法》和隆多喇嘛所著《各种梦兆观察法》等。苯教对梦有着独特的揭示和认知,传承有序,自成体系,已形成影响深远的苯教梦文化。现代社会,藏族民众对梦兆的解析,主要还是依赖民间宗教社团,以及苯教巫师或民间个体宗教职业者如“哈瓦”或“苯苯子”等,巫师、喇嘛对梦的阐释分析,人们往往深信不疑,非常虔诚。

在“康定七箭”的作品中,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,梦兆往往成为预示或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。格绒追美《隐蔽的脸》“喇嘛的梦”一节中,雅格老喇嘛梦见自己在跳舞,袈裟像风一样裹卷起身子,梦中,他看见自己腾空飞了起来,看见一个魔女变成一条龙似的怪物,和他对打,他也迅速变成一只硕大无比的鲲鹏,那魔女又变成一只花猫……“总是噩梦不断,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。比如,定曲河出现了断流,大地干燥燥热,如同一只火炉;雅格家向东的那面墙轰然倒塌,而宛绒村里更出现了一股股黑色的风,整个村庄像是罩在了黑暗里,不见天日,等等。而那只灵异的狐狸夜夜哀嚎,每每将他从梦中唤醒。他翻卜辞书,自己也卦算,而且还做了许多相应的法事,然而,却不见任何起色。他终于明白:天意如此。厄运已经虎视眈眈地来到了村庄。”雅格老喇嘛

这些混乱不堪的梦预示雅格家的劫难之轮开始启动了。小说还有多处章节写各种梦兆,如“预言”“梦魔”“活佛疯了”等等。无论是叙述手法,还是谋篇布局,作者大量采用与梦兆有关的虚构性写作,使小说充满了奇谲、迷离、虚幻的神秘色彩,常常埋伏着多重隐喻或转喻,弥漫着神秘而诡异的色彩,为读者的阅读增加无限的想象。“在雪域,到处都是捕梦之人,描画梦相之人。一些修行者还执著于法力在梦境中修炼,被称为瑜伽……”文本在对这些梦的描述中,让读者除了感受藏族宗教意味浓厚的诗性思维和文化心理外,其中似乎也隐含着人生如梦、万法皆空的深层文化意蕴,思考人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何种宽广的可能性,人作为个体或群体,在时间、空间、宇宙中的命运。

### 叁

笔者始终认为,文化的传承蕴含两个系统:一个是官方的、经典的、书面的系统;一个是民间的、通俗的、口传的系统。前者来自于文献,居于中心、主流的地位,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文明程度,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支柱。而后者来自于田野,处在一个民族的活力、信仰和生存智慧,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。前者是文化精英的个性化写作,呈现出清晰的理性;后者则是普通底层民众的集体智慧,依赖于丰沛的感性。前者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因素,后者以集体无意识状态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。前者庄严大气,充满了文化的核心凝聚力;后者生机勃勃,处于“活态”流动之中。在文化发展史上,这两个传承系统一直在一种相互影响、相互消解、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状态中,都是文化整体性的体现。只有厘清本民族文化内部不同传承系统的关系,或许才能真正看清本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及其传承脉络。而重视文化遗传基因,是如何作为文本系统、意义系统、象征系统、所指系统来表达文学性、价值观、信仰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关系,其实也是“全球化语境”和“地方性知识”的同步展开和相辅相成。

“苯”。古典长篇小说《勒努达美》以及“八大藏戏”等都采用了“说”“唱”结合、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表达方式。尽管在我国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中,藏族文学具有漫长的书面文学史,但藏族名著《西藏王统记》《西藏王臣史》《贤者喜宴》的很多书面章节如猕猴繁衍人类、文成公主的故事、修建大昭寺的传说等,都是根据民间口头传说进行艺术再加工。《米拉日巴道歌》也是在藏族民歌基础上创作而成。其他如《萨迦格言》《水树格言》《国王修身论》等被认为最富文采的文字优美之作正是因为融入了民间文化、口头说唱以及初民式的生动表达,才得以传承至今。

“康定七箭”的汉语创作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,他们的作品语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、质朴,呈现出一种简单化风格和“若愚”状态。文本表达整体上趋于直白化和形象化,语言结构也呈现简化趋势。对于有些几乎只能用藏语才能表达的语境,作者努力不让汉语淹没于藏族母语的口吻语气,尽可能地用汉语直译,保持藏族文化意味不被消减,希望在另一种语言中仍能奇妙地转换并准确地表达。康区民间流传的雄狮大王格萨尔王的传奇故事、青稞和牦牛的故事、猴和鸟的故事、阿古顿巴的故事……等等。这些积淀深厚、生机勃勃、细水长流的口头传说,闪烁着民间文化的灵光和智慧,成为“康定七箭”作家书面文本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。

藏族当代作家的创作叙事形态,一直表现出一种带有明显的民族自传性质和深刻的本土文化印记,还有民族志诗学的“细描”,呈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、个人感知与族群记忆、“个人话语”与“集体话语”、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相互交织的叙事风格。特定的文化遗传基因,蕴含了一定社会部族群体的集体无意识。看似原始简单朴素,甚至荒诞魔幻,却饱含复杂丰富的文学传承表述。充满敬畏、虔诚、禁忌,自然灵性、奇异想象的原始思维与初民意识以及直抵内心的口头歌谣,正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。“康定七箭”置身于多种文化之间,在视野上更为敏锐,更善于表达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沉潜,更能发掘自身文化和民族的独特性与优缺点。作品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情结、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烙印。他们的社会人生,理解表达,都与他们在“小传统”中,接触的传统形态与遗传基因密不可分。民间文化一代又一代的有序传承,虽然经过无数次的加工创造,虽然经不起历史或文献的考证,但其中的情感、思维、心理是真实的。“康定七箭”正是凭借对康巴文化遗传基因的关注与体悟,使他们捕捉到了历史潜行的踪迹和部族更为久远的文化心理。在这个层面上,无论生活在哪里,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,历史永远只是外壳,是生活表层不断流淌的东西,生生不息的是那些生活的潜流——活态流动中的生命本相。

在藏族当代文学中,作为底层成分的民间文化如神话传说、故事歌谣、格言谚语,以及信仰禁忌、巫木民俗等,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和书面文学的源头活水。相对于书面传统或正史,活跃在民间的口头传统、民俗禁忌,历史则更为漫长,足迹更为久远,这些“遗传基因”早已绵密入微地化入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,对民族文学文化发展,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。如杨义先生所言:“正史以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过滤材料,那些没有获得话语权的东西,就留在了民间,没有被记载下来,但是它一直在民间生长着,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生成、发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”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文化的传承系统,在文学上更是一种表达方式。冯梦龙《警世通言·卷十二》有言:“话须通俗方传远,语必关风始动人。”藏族口头传承有自己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、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。雍仲苯教创始人敦巴·辛饶弥沃齐生活的时代,已形成了以口传为形式的三种教法:“仲”“德乌”

以歌唱或吟咏进行叙事或传情表意是藏族文学的传统特征之一。当代藏族作家“康定七箭”的叙事文本自然大量运用民间歌谣和传说,这些歌谣和传说既承担着叙事功能,又充满了抒情色彩,与藏文学“说”“唱”结合的传播方式一脉相承。格绒追美《隐蔽的脸》中有首民谣说唱:最初斯巴形成时,阳山坡上长白竹,白竹顶上白鹤落,白鹤送来大米种;最初斯巴形成时,阴山坡上长青竹,青竹顶上青鹤落,青鹤送来青稞种;最初斯巴形成时,山坳中间长红竹,红竹顶上红鹤落,红鹤送来红麦种。这是藏族先民最早关于世界、天地山川、自然万物是如何形成的一组古老的问答歌《斯巴宰牛歌》,又称《斯巴形成歌》。歌中的斑鸠、大米、红麦、青竹,非常符合康巴藏区的气候自然环境。关于天地山川的形成,古

歌还有另外一组著名的《斯巴宰牛歌》:“问:最初斯巴形成时,天地混合在一起,请问谁把天地分?最初斯巴形成时,阴阳混合在一起,请问谁把阴阳分?……答:最初斯巴形成时,天地混合在一起,分开天地是大鹏,大鹏头上有什么?最初天地形成时,阴阳混合在一起,分开阴阳是太阳,太阳顶上有何?……”还有一组问答:“斯巴宰杀小牛时,砍下牛头放哪里?我不知道问歌手,斯巴宰杀小牛时,割下牛尾放哪里?我不知道问歌手,斯巴宰杀小牛时,剥下牛皮放哪里?我不知道问歌手。答:斯巴宰杀小牛时,砍下牛头放高处,所以山峰高耸耸;斯巴宰杀小牛时,割下牛尾在山阴,所以森林浓郁郁;斯巴宰杀小牛时,剥下牛皮铺平处,所以大地平坦坦;斯巴宰杀小牛时,剥下牛皮放路上,所以道路弯弯曲曲。”我们从后期的斯巴形成歌中,已经感受到,古歌中的“斯巴”已经不再是指“世界”或“宇宙”,而是康区民间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一个有力量的、壮观的草原牧民形象,简单而朴实的民间生活场景扑面而来。有的记载已将“斯巴”意译为“世故老汉”,歌中同样充满了牧民的日常生活气息。“天上不下金雨,地上怎么长出银猫?头人、阿古顿巴,人头怎能如割草。”“老虎落在草原上,绵羊磨开了牙齿;活佛当了匪,头人的狐皮帽哪里放?”

太阳就在头顶姑娘就在眼前我的身体暖和了我的心也烫起来。这些口语化的民间歌谣,通俗易懂,生动活泼,大大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在作品中也发挥着塑造人物,抒发情感,表达故事主题,推动情节发展的多维立体叙事功能。“康定七箭”的文本创作,无论是小说、诗歌或文化随笔,都深受地方性民间故事歌谣的滋养和影响。他们把民歌称之为“关乎灵魂的歌谣”“是难以释怀的生命经历”“与命运之感与心灵的隐痛息息相关”。传承千年的口头文学,不管是历史传说或者其他经典篇章,都往往以韵律优美、适合说唱的诗歌语言来叙事,或机智,或幽默,或忧伤,这种轻松幽默不乏智慧的民间表达手法,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巧思灵感,并无数次被作家拿来运用,使书面文本的故事情节、人物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)

